

自由競爭市場與如何 分享繁榮



一 引言

正當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快速崛起究竟是機會還是挑戰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之時，2004年夏天起中國內部也爆發了一場空前激烈的爭論，至今仍不見有收場的意味。捲入爭論的，既有位高名隆、德高望重者，也有來自草根、名不見經傳者。首當其衝的，是一時處於被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家^①。原因據說是他們長期掌握了經濟改革的話語權，而經改導致財富分配不公，板子自然應該打在他們身上。主流經濟學家經過一段被媒體渲染為「集體失語」的短暫沉默後，紛紛出來回應，有為現行改革方案的合理性辯護的，有呼籲爭論要取更理性態度的，也有主動作反思乃至深刻反省的。在批評改革缺失的人中，有懷念改革前的一貧二均歲月的，有直指改革是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陰謀的，但更多的人並不反對改革，而是呼籲改革的決策更為透明，致富的機會更應為民眾分攤，避免改革被利益集團劫持，改革成果愈益為少數人獨佔。

這場爭論其實反映了改革二十七年來一直迴避的許多深層矛盾，其累積效應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階段。針對眾說紛紜的局面，孫立平（以下簡稱孫文）認為「改革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破裂，改革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他並提出，中國「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裏，不要輕易進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時對此前的改革進行治理整頓，鞏固已有的改革成果，並重建改革的動力與機制」^②。此論一出，又引起改革共識究竟是否破裂的爭論，以及應該暫停改革，坐而論道，還是起而攻堅，將改革進行到底的爭論。

孫文的優點是觀點鮮明，直截了當。其缺點在於沒有定義何謂改革共識之前，便斷言改革共識已經基本破裂，繼而要求暫停改革，似乎過於突兀。本文試圖將關於改革的共識，分解為關於改革的必要性、改革迄今的成就、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的終極目標、改革的路徑、改革成果是否得到公平分享等項，

2004年夏天起中國內部爆發了一場空前激烈的爭論，首當其衝的，是一時處於被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家。原因據說是他們長期掌握了經濟改革的話語權，而經改導致財富分配不公，板子自然應該打在他們身上。批評改革缺失的人並不反對改革，而是呼籲改革的決策更為透明，致富的機會更應為民眾分攤，避免改革被利益集團劫持，改革成果愈益為少數人獨佔。

並對每一項是否有過共識，現在是否已經破裂，一一作出檢視，以回答改革是否應該暫停。然後，筆者對爭論的焦點，即如何分享繁榮，提出自己的看法。行文中筆者嚴格區別主流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家，這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由千差萬別的個人組成，他們對具體的問題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觀點。但主流經濟學有大致的範圍，比較容易定義。

二 改革共識大部還在，基本破裂的判斷下得過早

所謂對某一問題具有共識，並非要利害相關者有一致看法。只要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對該問題的看法有共同點，此共同點便為共識。以下就改革共識的各個方面，加以逐項審視。

關於改革的必要性的共識，不但在改革初期存在過，現在也是存在的，並且是難於破裂的。二十七年前，中國仍處於文革濃黑的陰影之中，由於殘酷而反覆無常的政治鬥爭，生活其中的每個階層心靈幾乎都充滿創傷。因而，要從這樣一個赤貧、專制、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盡快走出的共識是廣泛存在的。今天也許會有個別人好發奇想，將改革前的狀態浪漫化。好在今天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人對過去歲月的活記憶仍在。他們中有幾個願意回到改革前那種雖然表面平等，但是極端貧困、專制、愚昧的狀態中去？

關於改革的必要性的共識，不但在改革初期存在過，現在也是存在的，並且難於破裂。二十七年前，中國仍處於文革陰影之中，要從這樣一個赤貧、專制、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盡快走出的共識是廣泛存在的。今天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人，有幾個願意回到改革前那種雖然表面平等，但是極端貧困、專制、愚昧的狀態中去？對大部分人來說，原來的體系所提供的生活既貧乏愚昧，又絕對地不公。

國有資產的流失並非始於今日，從計劃體制建立一刻起便已開始，大躍進和文革更使這種流失速度無以復加。和今日國有資產流失的形式相比，當日的流失更為可怕。現在的所謂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只是轉手經營而已。因為流向私營部門，資產獲得再生和增值的機會。從民族整體來看，私營部門財富的壯大，畢竟等於民族整體財富的壯大。可是當年的國有資產流失，卻是絕對的毀滅，反映為大量的廢品，原材料的大量積壓，長官意志下的重複投資，企業的大量關、併、停、轉，森林、草原的萎縮，河流湖泊的消失，生態的極度惡化等等形式。這種財富毀滅的荒謬之處，在於沒有人因此獲得任何好處。這正合了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由於大鍋飯和鐵飯碗，特權體系內的人對此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沒見幾個人對此痛心疾首，慷慨激昂。而不幸生活於這一特權體系外的廣大農民和城市邊緣群體，則只有貢獻自己血汗的份，既無資格參與資源的浪費，更無權阻止資源的毀滅。所以，對大部分人來說，原來的體系所提供的生活既貧乏愚昧，又絕對地不公。

在改革迄今為止是否成功這點上的共識，不但存在過，今天也是難以破裂的。中國由農村開始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二十七年後的今天，已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實體和第三大貿易大國，名正言順地成為一所世界工廠。從豐富的農貿產品到各色工業製成品，不但在國內城鄉各類商場的貨架上琳琅滿目，也陳列於世界各地的大小商場內。中國的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空前繁華。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車輛，聳入天際的高樓大廈，從鬧市中心到郊外

無處不在的霓虹燈光，象徵着新消費模式已經滲透社會的角角落落。包括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在內的全體人民，其追求幸福的自由比起改革前確已大幅提高。中國社會的內在活力，是有目共睹的。

關於改革的指導思想的共識，早期也是廣泛存在過的，反映在鄧小平「摸着石子過河」，「白貓黑貓，抓着耗子就是好貓」的名言中。這樣的指導思想，雖然有無視別國經驗和現存理論的傾向，因而往往零敲碎打，缺乏系統性和徹底性，但對當時仍處於文革極左陰影下的中國來說，卻是一劑擊中時弊的良藥，避免了改革尚未展開，便深陷意識形態泥沼的危險。

改革派十分自信，只要改革能夠將蛋糕迅速做大，使絕大多數人分享到改革的好處，反對改革的人就會迅速減少。相對於計劃經濟的僵硬和文革遺產的荒謬，改革初期的許多措施不過是回到人們的常識，合理性一目了然，執行起來，十分利索，手起刀落，立竿見影。反對聲音未起，改革措施已經成功。例如包產到戶、允許農民流動、開放自由市場、恢復高考、知青返城、允許鄉鎮企業和私人創業等，對個人和社會都是增益極大、成本幾乎為零的帕累托改進 (Pareto improvement)，結果皆大歡喜。

但是，隨着改革的深入，這類皆大歡喜式的帕累托改進幾乎窮盡，剩下的改革措施大多為難啃的硬骨頭。這些措施雖然帶來的潛在社會增益可以極大，但對某些階層的既得利益有相當的損害。按照卡爾多補償原則 (Kaldor criterion)，只要某措施帶來的社會總增益超過某些階層蒙受的總損失，該措施仍有實行的經濟合理性，但需要政府擔負果斷的執行人和公正的擔保人的角色，誠實地將增益的一部分轉而補償蒙受損失的階層，以消除改革阻力，防止利益分配格局的惡化。顯然，這類卡爾多改進要求政府不再零敲碎打，摸着石子過河，而是確立新的指導思想，以提高對未來的改革措施的整體把握和相互配套的理解，才能既推進改革，又使受損者的補償及時到位。無疑，這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公正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政府並沒有及時修正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仍然顯得零敲碎打，缺乏系統性。

關於改革的終極目標的共識，情況要更複雜得多。在改革早期，出於對匱乏的恐懼和文革式專制的憎惡，無論黨內、黨外，都同意將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作為改革的兩大目標相提並論。但是，如何實現政治民主，黨內各派和社會各界其實一直存在分歧，並無共識。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因對政治改革的想法過於「超前」，無法為黨內保守派容忍，又失去鄧小平的支持而黯然下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蘇東波發生後，雖然社會各界的分歧仍在，黨內反而形成共識，政治改革必須緩進。所以，現在提起改革，一般僅指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的口號雖然還在，但僅指行政改革，後來加上以法治國和基層民主選舉。但這些提法迴避了司法獨立和主權在民的思想，畢竟無法構成政治改革的終極目標。

不過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倒是愈來愈明朗。特別是2001年後，關於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的共識是，中國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符合WTO的關於市場經濟的原則和條例，與世界市場充分接軌。這一目標的確立，是江朱體

鄧小平「摸着石子過河」，「白貓黑貓，抓着耗子就是好貓」的名言，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避免了改革尚未展開，便深陷意識形態泥沼的危險。但是，隨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要確立新的指導思想，以提高對未來的改革措施的整體把握和相互配套的理解，這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公正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政府並沒有及時修正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仍然顯得零敲碎打，缺乏系統性。

系必將載入史冊的主要成就，其可行性也是經得起推敲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论對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優越性有嚴格證明，有幾十個發達國家的成功實例作支撐，並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試驗中央計劃經濟的失敗實踐作反證。將市場經濟制度作為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的共識，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不但在本次爭論之前存在，即使今天也沒有破裂。如果有分歧的話，不在於這個目標本身是否值得爭取，而在於具體的細節，諸如中國將來的市場經濟模式會成為北歐那樣的福利社會？還是成為像英美那樣比較自由放任的社會？還是無可奈何地滑入拉丁美洲式的權貴壟斷市場資源的社會？

1989年後，黨內對改革路徑的共識發生劇烈變化，由雙軌推進改為單軌推進經濟改革，原因是黨內關於政治改革的共識不復存在。目前，關於改革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否應該及時修正，政治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否應該明確化和具體化，改革的路徑是否應繼續單軌推進或改為雙軌齊進，以及如何避免貧富差距的加速擴大。

關於改革路徑的共識，確實在愈來愈縮小。1989年後，黨內對改革路徑的共識發生劇烈變化，由雙軌推進改為單軌推進經濟改革，原因是黨內關於政治改革的共識不復存在。社會上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不少人對單軌推進經濟改革抱着觀望和默認的態度。1989年至今十七年過去了。在目睹收入增長、財富積累的同時，貧富差距快速拉大，貪污、腐敗盛行，弱勢群體的利益和訴求經常遭到漠視和蔑視，群體性抗爭層出不窮，捲入的人數急劇上升。顯然，唯有實現分享式繁榮，單軌推進經濟改革才能獲得較大範圍的共識。雖有繁榮，但未能分享，或繁榮為經濟危機所替代，兩者居一，人們都會對單軌推進經濟改革這一路徑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產生嚴重懷疑，並要求改向。所以，單軌推進經濟改革而能成功的可能性已愈來愈小，適時推出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是必要的。

關於改革成果是否得到了公平分享的共識，應該說走過了由存在到幾乎破裂，到部分再現的過程。共識部分再現的原因，來自胡溫體系的多次表態和對弱勢群體多項救急措施，也得益於本次爭論。如今人們目睹經濟迅速擴張，財富迅猛積累的同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顯然，政府對改革措施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增量的調節存在嚴重問題。對繁榮未能分享的原因，分歧很大。一派認為市場改革不徹底，須要進一步深化；一派認為市場改革已經過度，應該退回去實行「國進民退」，或「擴大計劃部分」；第三派則認為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結果。本文將稍後討論上述分歧。

由以上討論看出，關於改革的共識確在縮小，但不能說基本破裂。總而言之，關於改革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否應該及時修正，政治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否應該明確化和具體化，改革的路徑是否應繼續單軌推進或改為雙軌齊進，以及如何避免貧富差距的加速擴大。

三 政府切忌代替市場完成收入的一次分配

爭論中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單軌推進經濟改革還能走多遠？如果需要政治改革配套，配套的重點何在？人們提出這些疑問，當然是基於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現狀。所以，對貧富差距在同一地區內，地區間，以及城鄉間不斷加劇的原因，必須作深入分析，才能回答為甚麼深化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會有助於

減少因特權和壟斷造成的收入差距，並有助於人們接受基於市場公平競爭帶來的收入差。

今日中國收入不等的原因很多。從爭論的火爆性看出，對改革結果心懷失望的人正在增加。這些人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對改革措施所導致的利益分配結果是否公平的質疑上。基於智力和體力等天賦的不同，或基於後天努力程度的不同，或基於所處地域的自然稟賦的差別，或出生的家庭境況的懸殊，造成結果不等，大家還是能夠接受的。彌補之道是允許人民遷徙自由以促進民眾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普及教育以促進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但是，如果起點的不平由制度性特權造成，由此導致結果的不等，就會引起大家特別的憤憤不平。彌補之道，當然是廢除一切政治特權、行政壟斷、地域限制、身份歧視，對所有個人和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一視同仁。

今日中國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於壟斷和特權的普遍，產權界定不明，保護不力，自由競爭原則遠未確立，市場機制遠未完善。所以，市場化不是太過，而是十分不夠。面對被政治特權、行政壟斷和部門壟斷嚴重扭曲的市場環境，改革措施要麼無法推行，要麼遭到扭曲，產生的增益為權貴劫持，使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日益惡化。

例如，在維護農地集體所有的「神聖」名義下，中國的農地不准私有，不准自由買賣，只能由政府低價壟斷收購。因而，中國雖自稱市場經濟，卻不存在真正的土地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為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出台的有關徵用農地的改革措施，使享有政治特權的地方官員和享有金融壟斷的開發商可以作權貴之間的交易而一夜暴富。農民作為土地的真正主人，則淪為圈地對象，丟了土地，卻沒有得到公正補償，面臨謀生的困難。農地集體所有本來說是保護窮苦農民，結果已經造成四至五千萬因失地而致貧的農民。這部分為數眾多的失地農民，本來應該憑藉土地產權，分享至少二萬億元的土地增值，作為重新創業的啟動資本，並會因此大大改善中國城鄉收入的基尼系數值。可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巨額的土地增值主要集中於少數貪官手中，並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開發商。結果自然是大大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和城市內的貧富差距，並使中國城鄉基尼系數十分難看。只要農地沒有私有化，失地而貧困的農民人數只會進一步增加。這是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下不會發生的事。

這次爭論中，不少人將板子打在腐蝕官員的奸商身上，似乎官員本來天真無邪，清清白白，可恨的只是引誘官員的奸商。這只說對了一半。在商言商，商人追逐的是贏利。為了獲得資源（例如土地的批租，政府的採購訂單，能源、礦山的開發，國有資產的收購，辦學、辦醫等權利），必然會進攻控制資源的官員。從經濟發展的道理來說，向全民開放各種資源，廠商公平競爭，出價高者得之，也是天經地義，利國利民的好事。出現猖獗的官商勾結，匡正之道，不在於進一步用政府之手壟斷資源，而在於進一步開放資源的市場公開交易。將目前的收入分配惡化，歸罪於過度市場化，顯然是不懂何謂真正的自由競爭市場，何謂鄒至莊教授所說的「官僚市場經濟」。後者用社會主義名義大行封建等

今日中國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壟斷和特權的普遍，產權界定不明，保護不力，自由競爭原則遠未確立，市場機制遠未完善。所以，市場化不是太過，而是十分不夠。面對被政治特權、行政壟斷和部門壟斷嚴重扭曲的市場環境，改革措施要麼無法推行，要麼遭到扭曲，產生的增益為權貴劫持，使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日益惡化。

級，地區封鎖，部門壟斷和花樣百出的將公民及其企業按所有制分三六九等，實行各種歧視和限制，使中國的收入分配日益惡化。

盡快確立市場經濟最基本原則，還有一個深遠的意義，就是為比較公正的收入分配提供不易引起爭論的客觀基礎。今日的中國大家特別執著於「公正」兩字，自然是出於對貧富懸殊的反感。也因此不少人批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覺得中國到了應該實行「公正至上，兼顧效率」的時候。可是，離開自由競爭市場，公正便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經過文革的人都能同意，絕對平等不但不等於公正，而且會窒息效率。適當的收入差別，反而反映公正。

但是，中國今天的市場離開充分自由而公開競爭的市場，仍有極大的距離。例如像《物權法》、農地私有化、市場自由進入、自由競爭等代表歷史的進步方向，並有普世價值的法律和原則，在中國都還沒有確立。所以，當務之急是明晰界定所有權和產權，保障私有產權，對不同所有權的企業一視同仁，保護所有企業和個人自由進出市場的權利，使勞動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正常運作，並用這樣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來完成收入的一次分配。雖然收入分配仍然有貧富差別，但正像體育競賽中必然有勝有敗，人們願意作為公正的結果而接受。和競賽場上的勝敗不同是，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和基於均衡價格的交易，必然使交易雙方都較交易之前的狀態有所改善。即使如民工這樣其境遇令道德家們唏噓不已，但對民工來說，只要能夠來去自由，其境遇相對在家務農一定有所改善。

由自由競爭市場解決收入的一次分配，不但大大減少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責任，也大大減少政府的尋租行為，並使中國避免走上某些福利社會將公正置於效率之上的陷阱。在官強民弱，又嚴重缺乏公信力，貪官污吏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政府的武斷介入，比起市場上不依賴人際關係的客觀交易，往往更激起人們的抱怨和猜疑。即使在政府必須介入才能推行的卡爾多改進的地方，也離不開自由競爭市場上形成的均衡價格的參照系。改革措施涉及的利害雙方，都不應憑空喊價，尤其不能憑壟斷特權，以勢壓人，而應以自由競爭市場上形成的均衡價格為參照，否則無論增益還是損失都無法計價，更談不上由政府主持公平補償的問題。

中國今天的市場離開充分自由而公開競爭的市場，仍有極大的距離。當務之急是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來完成收入的一次分配。這不但大大減少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責任，也大大減少政府的尋租行為，並使中國避免走上某些福利社會將公正置於效率之上的陷阱。改革措施涉及的利害雙方應以自由競爭市場上形成的均衡價格為參照，否則無論增益還是損失都無法計價，更談不上由政府主持公平補償的問題。

四 貧富差距擴大是主流經濟學的失靈，還是政府失靈？

論戰中，不少人認為中國目前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惡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並歸之於主流經濟學的固有缺陷，甚至認為主流經濟學家明知市場經濟的缺陷而隱下不提，因而有誤導政府和民眾，與奸商狼狽為奸的嫌疑。這些情緒化的指責，邏輯上有兩個漏洞。第一，個別主流經濟學家也許有忽視市場失靈的時候，但不等於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有這類失誤。第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等於世界上的主流經濟學。實際上，主流經濟學既然是對幾百年來現

代市場經濟正反實踐的理論總結，自然涉及市場失靈、收入和財富的公正分配，以及市場失靈的匡正之道的討論。目前中國惡化中的貧富差距，是無法歸罪於主流經濟學的。

主流經濟學家因為多是「海歸」，因而被當成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代言人」。平心而論，「海歸」經濟學家在教育、決策、研究部門的迅速崛起，確實得益於他們的訓練和眼光。他們畢竟在先進國家學習、生活過，知道先進國家如何處理中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現代經濟學並非來自空中樓閣，而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是和主流經濟學家的貢獻分不開的。可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往往被貼上新自由主義或西方經濟學的標籤。不但改革的局部失誤被歸咎於他們，而且他們的動機和為人也往往被人懷疑和質疑，成為被人批評甚至攻擊的主要對象。主流經濟學家之間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也會有犯錯的時候。但面對各種複雜的經濟問題，「海歸」經濟學家中總會有人提供解決的方案，不像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動不動就用階級分析法和剩餘價值論，不但和中國的實踐距離很遠，對中國目前追求的和諧社會的目標也十分有害。這套理論極少建設性，卻極具顛覆性。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是提供社會批評，以便使政府對社會弊病提高警惕，並促使主流經濟學家積極尋找對策。

檢討主流經濟學能否適用中國社會，不能以個別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為準，而應以主流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和結論為準。主流經濟學使幾十個歐美國家以及東亞的一些鄰國變成既有持續繁榮，又有公平分享的社會。原因何在呢？

首先，主流經濟學主張明晰產權，保護產權，不但是為了效率，而且正是為了保護願意通過勤奮工作來改善生活，積累財富的普通民眾。在主流經濟學所構建的社會中，收入和財富來自公開而自由競爭的市場，而不是來自政治特權和出身血統。這樣的社會裏，財富既是得到保障的，又是很快流動的。一言以蔽之，財富和收入與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掛鉤，才是最基本的社會公正。可是在產權得不到界定，不准擁有私有產權的社會裏，所有的財富事實上成為了權貴的囊中之物。權貴既然有權有勢，成為法律之上和之外的特權階級，自然不用仰賴產權保護。對他們而言，愈是產權沒有界定和保障，愈是可以憑自己的權勢肆無忌憚地掠奪社會公產和民眾私產。獲利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而任人宰割的都是弱勢群體。這在產權明晰的社會裏是不可想像的。

其次，主流經濟學主張凡競爭性市場能夠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應該盡量留給市場解決。這一主張不但基於競爭市場更能導致效率的優化的理由，而且體現了對人性的深刻認識。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就指出的，如果我們的福利是建基於別人的善心之上，這種福利會十分脆弱；只有當我們的福利是建基於別人對他們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上，這種福利才會有堅實的基礎。所以，我們不需要為市場經濟抹上道德的光彩，而是理直氣壯地承認，市場經濟確實是建於人們的逐利動機之上的。在法律範圍內的逐利是每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既沒有甚麼崇高，也沒有甚麼可鄙。正是基於這種逐利之上的競爭機制，

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往往被貼上新自由主義或西方經濟學的標籤，不但改革的局部失誤被歸咎於他們，而且他們的動機和為人也往往被人懷疑和質疑，成為被人批評的主要對象。檢討主流經濟學能否適用中國社會，不能以個別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為準，而應以主流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和結論為準。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動不動就用階級分析法和剩餘價值論，不但和中國的實踐距離很遠，對中國目前追求的和諧社會的目標也十分有害。

使社會的產品極大豐富，使業主對顧客一視同仁，笑臉相迎，和頂着為人民服務的溫情脈脈的桂冠，將城鄉居民分為三六九等的身份加以歧視，產品貧乏單調，服務冷酷無情的計劃經濟相比，可說有天壤之別。

第三，主流經濟學從來沒有將市場美化為人間天堂，完美無缺。相反，基於稀缺性理由，主流經濟學否認產品可像泉湧般取之不竭，因而能在人間建成按需分配的天堂式社會。基於市場自身的局限，主流經濟學意識到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對市場失靈有詳盡的討論，並提出匡正之道，便是引入反映民意的政府干預。從反壟斷，抑制負外部性(例如環保、生態保護)，發揚正外部性(例如扶助教育、醫療和科研)，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幫助弱勢群體獲得起點的平等(助學金、社會救濟、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到公共產品的提供等等，現代政府已經被賦予遠遠超過守夜人的重大責任。認為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市場失靈，或對市場失靈缺乏匡正之道的說法，恰如天方夜譚。而且要指出的是，主流經濟學高度警惕引進政府干預市場的代價，對包括尋租行為在內的政府失靈的後果，有充分的討論。這和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在批評市場的同時，將主要希望寄託於加大政府干預，卻忽視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及其巨大代價十分不同。筆者這裏要特別呼籲高度警惕政府失靈的代價，以免將來民眾對政府的貪污、腐敗憤怒之餘，又將板子打到主流經濟學身上。這也是為甚麼筆者呼籲盡量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解決一次分配的原因。

主流經濟學意識到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提出匡正之道，便是引入反映民意的政府干預。但主流經濟學高度警惕引進政府干預市場的代價，對包括尋租行為在內的政府失靈的後果，有充分的討論。這和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在批評市場的同時，將主要希望寄託於加大政府干預，卻忽視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及其巨大代價十分不同。

第四，主流經濟學同時也承認，即使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基本公正，但是由於各人事實上面臨不同的起跑線，政府有通過稅收，調節收入的再分配的責任。例如，天災人禍，疾病傷殘，總會使一些家庭陷於貧困。政府有責任幫助他們維持生存，並使他們的後代逐漸擺脫貧困。所以，通過稅收調節人們的收入，幫助不幸的家庭在社會中重獲自食其力的能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防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世代延續，每況愈下，最後導致暴力革命的必要手段。事實證明，堅持由自由而公開的市場解決一次分配，由反映民意的政府通過稅收、義務教育、自由遷徙、社會救濟等手段，調節收入的二次分配，能夠防止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有效降低盲目仇富心理，避免絕對平均主義的發酵，同時避免陷於福利社會的泥沼，喪失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五 結論：與其被動辯解，不如主動宣導

綜觀近代歷史，歐美主要國家的崛起，都曾借助發聵振聵，席捲社會的文化運動，清除舊的意識形態，確立新的意識形態，使民眾理解為何基於新理念之上的社會更為合理，更值得嚮往。用意識形態開道，可以大大減少新興階級崛起時的阻力。廣大民眾即使沒有主動成為改革的動力，至少大部分不會成為死硬的阻力。

中國的改革派雖然竭力想迴避有關意識形態的爭論，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至今也沒有擺脫「體」和「用」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使得改革阻力重重。繼續迴避爭論的結果，常常使一些基本的，本來應該作為市場經濟前提的改革措施，因缺乏輿論開道，名不正，言不順，往往胎死腹中。過時的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及時清理，死守教條的人便始終得以佔據所謂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的制高點，對改革稍有不滿，便以正統自居，指責改革的性質和動機。例如，《物權法》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前提，早應出台。然而在改革進行到第二十七個年頭，竟然因為有個別人基於姓「資」姓「社」這樣純粹的意識形態理由，便使其束之高閣，無法正式生效。可見，中國已經到了必須突破已有的改革指導思想的時候了。

中共十五大決議已經把共產主義的目標推到幾百年後的遙遠將來，並將目前的中國定性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是，用放大鏡審視每一項改革措施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人，仍很「時髦」，很「革命」，有天然居高臨下的「氣勢」，彷彿天下是他們的，別人都是窺視者和別有用心者。和一百多年前將外國技術看作「用」，儒學看作「體」的人唯一的不同是，如今某些人將市場機制看作「用」，而將現行的政治體制看作不能改變的「體」。可笑的是，這個不能改的「體」，實際上也是來自外國，基於馬克思對早期市場經濟的批評之後產生的政治空想之上。馬克思作為一名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一些研究機構和學校有人研究他的思想和影響，借鑑他的批判的合理內核，應該不是問題。但是，對已經完成革命，力圖建設和諧社會的今日中國來說，將這種富於顛覆性的學說定為國學，令人不可理解。無論是為了構建和諧社會，還是與各國共建和諧世界，中國都急需新的理論，以減少經濟改革的阻力，減少世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疑慮，並為最終的政治改革鋪平道路。這是因為要真正確立充分自由、公開競爭的市場制度，真正廢除任何政治特權，防止任何個人和政黨位於法律之上，離開徹底的政治改革是無法實現的。

中國至今也沒有擺脫「體」和「用」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使得改革阻力重重。繼續迴避爭論的結果，常常使一些本來應該作為市場經濟前提的改革措施，因缺乏輿論開道而胎死腹中。過時的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及時清理，死守教條的人便始終得以佔據所謂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的制高點，對改革稍有不滿，便以正統自居，指責改革的性質和動機。

註釋

① 主流經濟學家在本文中特指在國內或國外接受過現代經濟學的系統訓練，自覺運用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分析問題的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家對同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們一般接受現代經濟學基於人的自利性假設，因而只能依靠自由競爭而開放型的市場來配置資源，組織生產和分工，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只能是輔助性的和第二位的結論。非主流經濟學家則指拒絕運用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分析問題，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希望政府在這兩方面扮演主要職能。

② 見孫立平2005年9月20日以「改革共識基本破裂」為題答《經濟觀察報》記者殷練問 (<http://dailynews.muzi.com/news/ll/chinese/1407574.shtml?cc=24238&ccr=>)。